



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赵宗福 主编

多元村落民俗文化研究

——以青海苏木世村落为个案

霍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赵宗福 主编

多元村落民俗文化研究

——以青海苏木世村落为个案

霍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元村落民俗文化研究：以青海苏木世村落为个案/霍福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9

(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2071 - 2

I. ①多… II. ①霍… III. ①村落文化—研究—湟中县

IV. ①K294.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444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刘 艳

责任编辑 刘 艳

责任校对 吕 宏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装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2

字 数 325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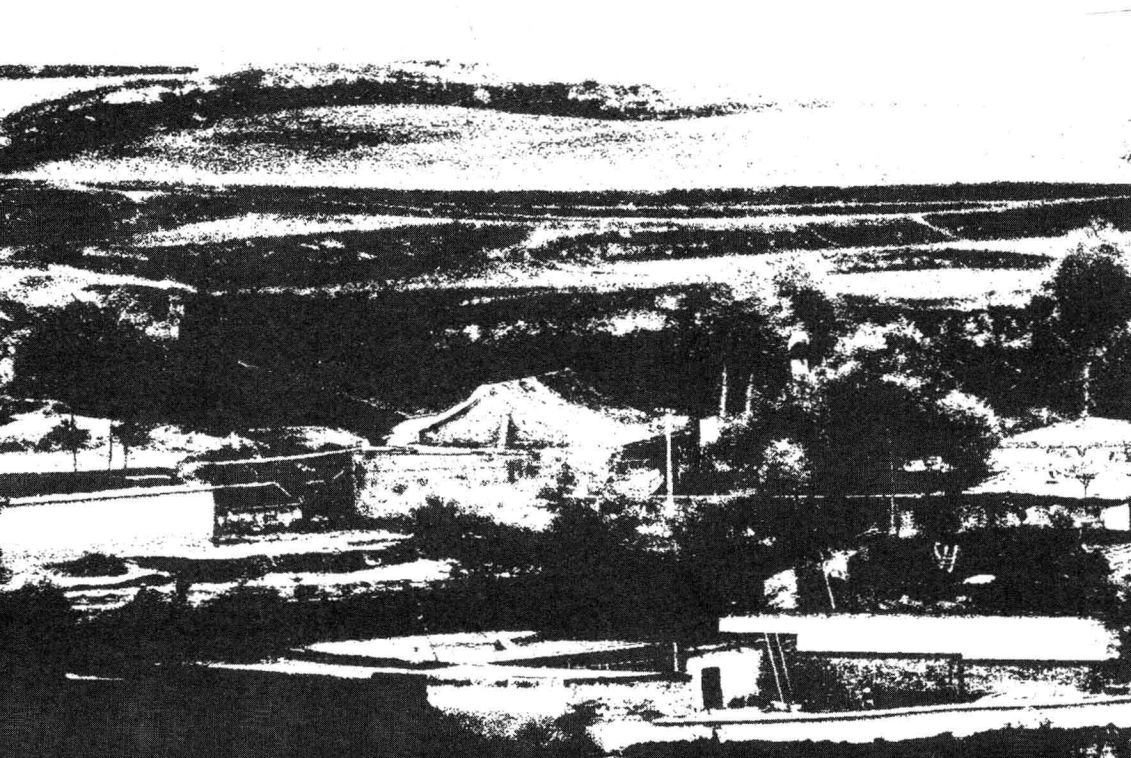
电话: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批准号：07XMZ021



总 序

赵宗福

2011 年秋天，在印第安纳举行的美国民俗学会年会和在潍坊举行的中国民俗学会年会上，我提出了推进“地方民俗学”的学术设想，意在实实在在地发展繁荣区域民俗化学事业。

中国民俗文化不仅源远流长，而且由于地域辽阔，民族众多，文化样式繁多，民俗文化更是丰富多彩，多元一体是中国民俗文化的一大特色。正因为此，钟敬文先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总结出了中国民俗学的独特性格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①。即使是分布区域很广，人数近十亿的汉族，也由于极为广泛的分布与地方化，其民俗文化也具有极强的地方性。所以各地民俗文化的地方性特点极其明显，不可一概而论，或者说一言以蔽之，需要更有针对性地对具体对象进行研究。这就需要有地方民俗学的存在。我理解的“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就是我国诸多地方民俗学的整体概括。

由于各地的民俗学研究队伍状况和学术兴趣点不同，逐渐就形成了富有地域性的学术个性和研究倾向，形成了不同风格的地方民俗学。特别是已经成立了地方民俗学学会和有高校民俗学学科点的地区，往往在学会或学科点的主导下，基本上有自己的学术侧重点和表述风格，成果也相对集中在某些方面。如青海民俗学界的成果往往集中在 6 个世居民族的民俗文化和在青海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上，古老的昆仑神话、多民族民歌花儿与花儿会、土族狂欢节纳顿、藏族史诗格萨尔、热贡文化、各民族婚礼以及歌舞风情等等，是当地学者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这也说明事实上具有

^①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29 页。

地域特色的“地方民俗学”是客观上已经存在的。

但是，不论地方民俗学如何发展与繁荣，都不可能与全国民俗学界绝缘，孤立地闭关而自得其乐。而是作为中国民俗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自愿地聚集在中国民俗学的大旗之下，至少与国内同行频繁交流，相互切磋，共同进步。同时，不同风格、多彩多姿的地方民俗学，也有力地支撑了中国民俗学这座学科大厦，丰富了中国民俗学的学术内涵，其地位贡献是不可忽视的。

正是以上这种局面，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与学科繁荣。这里借用日本学者佐野贤治教授的一句话：“21 世纪的民俗学应当在乡土、国家、世界三者的关联中推进自己的学科研究。”^①我暂且把他说的“乡土”理解为地方民俗学。就是说中国民俗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地方层面的民俗学研究和民俗文化土壤，同时也离不开国家层面如中国民俗学会及其相关学科点的整体发展规划、组织协调和引领指导，以及世界前沿的学术眼光和理论方法创新。

事实上三者之间是相互交叉甚至融汇的，因为民俗文化资源是大家共享的，同时地方的民俗文化所面临的问题和价值基本上也是全国性的甚至是国际性的。所以对某一地方的民俗文化研究不仅仅是本地区的学者，往往有外地（特别是北京）甚至国外的学者来直接研究，其成果既是全国性的，也是地方性的。比如青海的花儿、格萨尔、黄南六月会、土族纳顿会等，国内外的学者都在研究，而且与地方学者相互借鉴，甚至相互合作，共同建构起了青海民俗文化研究的事业。

民俗文化是我们的父老祖辈们在生产生活中创造的最具有历史底蕴和生活气息的文化。她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还是未来的；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更是我们的文化 DNA。自从我们降临到这个世界上，就被自己所处的民俗文化所熏染、所教化、所塑造，最终把我们社会化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享用者、传承者和创造者。而我们作为民俗文化工作者，不仅仅是一个个民俗生活者和文化传承者，还是一个个民俗文化的田野者、探索者、诠释者，我们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和学术使命。

^① 佐野贤治、何彬：《地域社会与民俗学——“乡土研究”与综合性学习的接点》，《民间文化论坛》2005 年第 4 期。

地方民俗学者研究的对象虽然大多是地方的民俗文化，但其意义不凡。一是科学地挖掘地方民俗文化内涵，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为保护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尽到一个地方学者的责任；二是通过民俗学的学术资源，参与和支持地方文化建设，发挥民俗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与促进文明进步方面无可替代的作用；三是通过民俗研究与学科建设业绩，推动中国民俗学科的发展和国家学术事业的繁荣。这就是作为一个地方民俗学者对民俗文化应有的情感认知和责任担当。

作为地方民俗学者要真正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必须要遵循学术规范，追求学术品质。唯其如此，方有可能以优异的业绩来实现学术愿望，否则就只能是理想上的巨人，成果上的矮子。

学术品质基于学术规范，而学术规范对学术来说就是道德品格，学术与非学术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遵循学术规范。就跟一个人一样，对社会对他人没有诚信，没有感恩之情，没有敬畏之心，没有正确的耻辱感和是非观，这个人就不可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事情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益于社会，他也不可能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认同。所以，人品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基本保证，而学术规范就是学术品质的基本保证。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必须要自觉遵守学术规范，不断提升学术品质。

这些年来，由于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学术浮躁之风盛行，一些人把天下利器当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玄学游戏，从概念到概念，不切实际，洋洋数十万言，管用的没几句；有的人把学问当成了坑蒙拐骗的黑市场，复制加粘贴，抄袭加改编，洋洋万言不见一个文献出处，不见自己一点个人见解，人云亦云，甚或以讹传讹，严重影响了社会科学应有的学术严肃性和文化软实力。这种现象自然也不免污染到了民俗学界，“民俗主义”乃至伪学术甚至部分地占据了神圣的学术殿堂。这是值得警惕防范的。我们主张在民俗文化研究要“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提倡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和扎实严谨的学风文风，坚决反对学术不端，严格遵守学术伦理。我相信学问无愧我心，公道自在人心。

在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中，不仅要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还要大力鼓励学术创新精神。文化的发展繁荣要靠创意，科学的发展繁荣要靠理论观点方法的创新。创新是人文科学的使命和责任，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必须要有理论观点上的新收获，没有创新的科研过程实际上就是一种资源的

全方位浪费，甚至是一种犯罪。所以我们的地方民俗学者必须要始终不渝地追求学术创新，以创新的高质量的成果来为民俗学学科建设和文化强国建设增光添彩。具体地说，就是要坚持立足地方民俗文化的实际，放眼国内国际的学术语境，以地方民俗文化研究为内核，运用学科前沿的理论方法，推出一批代表地方学术水平乃至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能够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民俗文化调查研究的优秀成果，让我们的民俗文化研究走出地区，走向全国，在国内外学术平台有一席之地，从而体现出地方民俗学者应有的价值。

青海民俗学会推出这套《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就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在学术规范和学术品质上下功夫，试图从较高学术层次来展示青海地方民俗学的业绩，同时也从地方民俗学层面来为中国民俗学学术事业添砖加瓦，共同推进“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建设。

青海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交融地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展现地之一。^①而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民族民俗文化就是这三个“之一”的鲜活表征。从古老的昆仑神话到丰富多彩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都给世人留下了神圣、神奇、神秘而令人神往的大美青海印象，同时也彰显出了极为丰厚的文化内涵和十分鲜明的文化特色。因此历来得到学人们的关注和重视，至少在唐宋以来的大量古籍文献中就有对青海民俗事象的诸多记载，而在20世纪前叶，出现了像杨希尧的《青海风土记》、逯萌竹的《青海花儿新论》、李得贤的《少年漫谈》等民俗志记录和评论文章。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民俗文化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青海花儿、藏族拉伊、各民族民间叙事诗、民间故事、民间歌谣以及其他民俗文化的搜集整理出版卓有成效，至今惠及学界。特别是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不仅整理出版了“民族民间文化十套集成”等大型资料丛书，而且高层次高质量的学术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尤其是近年来，青海民俗学者先后推出了《青海花儿大典》、《昆仑神话》、《土族民间信仰解读》以及《青海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等一批富有特色的成果；还连续举办了“昆仑文化与西王母神话国际学术论坛”、“昆仑神话与世界创世神话国际

^① 《强卫在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大会上的讲话》，《青海日报》2011年12月1日第1版。

学术论坛”、“昆仑神话的现实精神与探险之路国际学术论坛”、“格萨尔与世界史诗国际学术论坛”、“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等高端学术会议。而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学科点、青海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的建设，为青海民俗文化研究队伍的学历层次提升、学术成果的规范起了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我们多年来对昆仑神话和昆仑文化的研究与论证，得到了青海省委省政府的认可和采纳。2011年11月召开的全省文化改革发展大会上，把青海文化定位为“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文化”，正式开启了建设青海文化名省的新征程。这既是对青海民俗学界研究成果的认同，同时也为青海民俗文化的研究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于是，青海省民俗学会在2012年5月应运而正式成立。中国民俗学会、美国民俗学会、日本民俗学会、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台湾“中国民俗学会”、“中华民俗文化研究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中国艺术人类学会等国内外50多家学术单位以贺信贺函方式进行了支持。学会的成立，为青海民俗文化研究从零散无依、各自为阵形成学术合力、走向集约化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学术环境和组织基础。

青海省民俗学会是目前青海省各学会中学历层次和学术阵容最强大的学会，目前有会员100多人，其中拥有民俗学或相近专业的硕士博士学位者近80人。理事会27人中，博士8人，硕士16人。在地方学会队伍中，这无疑是一支专业素养很高、学术研究潜力很大的难得的精良部队。如何调动全体成员的积极性，真正形成具有团队精神的地方民俗学学术力量，充分展现他们民俗文化研究的优势，发挥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的功能，为中国民俗学学科建设和中国的学术大厦实实在在地尽一份力量，这是我重点思考的问题。

青海的民俗文化是青海乃至国家的重要文化资源，是青海文化软实力的组成部分，发展文化产业离不开民俗文化，“非遗”保护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文化名省离不开民俗文化，建设新青海也离不开民俗文化。青海民俗文化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民俗学会当然要顺应时代，乘势而上，发挥自己的学科优势和学术优势，在文化名省建设中积极进取，做出应有的贡献。

在我看来，青海民俗学会作为本土的地方民俗学会，首先立足于青海的民俗文化实际，以青海民俗文化为研究对象，以田野作业为基本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推出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的调查研究力作，这是毋庸置疑

疑的。但是，立足于青海不等于学术视野局限于青海地域，而是要把青海民俗文化放置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民俗学学术视野中。惟其如此，才能做出具有国内国际水准的学术成果来，也才能真正建设好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民俗学，在学坛上才能赢得话语份额。事实证明，没有自己的学术话语，就没有相应的学术竞争能力和文化输出能力，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学科或学术团体。所以，必须立足青海民俗文化实际，面向国内外民俗学领域，追踪本学科前沿，了解相关学科及整个学术界的发展动态，兼容并蓄，提升品质，努力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理论表述风格和学术研究实绩，不断增强学术软实力，不断赢得学术话语权，真正树立起青海地方民俗学者的形象，树立起以昆仑文化为主体的多元一体民俗文化形象。

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自学会成立之日起，我就把学会的奋斗目标定为立足青海，放眼国内国际学术语境，努力推进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民俗文化研究。也就是在采用民俗文化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普遍性学术理论方法的同时，坚持青海民俗文化研究的本土化与民族化，致力于青海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的民俗文化研究，以独到而不俗的学术业绩来形成具有青海特色的地方民俗学。这样的定位也得到了同仁们一致的认同。

按照学会“开展学术活动，追求卓越品质”的原则，学会对学术发展做出了具体安排。一是以不同形式不同规模开展民俗文化田野工作，摸清青海民俗文化家底，重点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民俗文化事象；二是每年至少召开一次年会，选择某一主题进行民俗文化研讨，力求推出一批新成果；三是积极参与青海省各级各类学术活动，多方位地为地方文化建设服务；四是积极策划主办或者协办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借以提升学术层次和学会影响力；五是积极与其他学会合作开展民俗文化调查和学术研究。同时提出集中力量办几件学术实事。其中之一就是在会员成果中精心遴选组织，争取由国家级出版社出版“民俗文化研究丛书”。这套丛书就是根据这一思路，从会员中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结项课题、优秀的硕博论文和个别确有前期研究基础的自选项目中筛选，然后统一规划，统一目标，并根据出版社和编辑的要求进行修改完善，再统一推荐出版。我们的目标是做成一套具有较高品质和学术含量的纯学术丛书，计划出版20本左右。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非是简单的把大家的成果集中出版。这些年来，

我们以学会筹备组和青海师范大学民俗学学科点、青海省社会科学院为核心，每年积极组织省内民俗学者高标准地策划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选题确定到申报文本写定，从获批立项到开题论证，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比如在2012年青海民俗学者获批国家基金项目10余项，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我们的“民间”形式组织学者反复开会论证申报文本的，一遍遍地修改完善，个别文本甚至经过了三到五次论证才完成，最后以学者所属各单位的“官方”程序上报获批。这就是有同仁开玩笑的“辛苦归我们，荣誉归别人。”作为民间团体的工作，不仅仅是开会的费用，还有到处找会议场所、邀请专家学者、牺牲大家的休息时间、一次次地修改和打印文本，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当事者才能体会到。当然天道酬勤酬善，多年来我们帮助策划论证后申报的民俗文化方面的项目也几乎是“无一漏网”地被获批立项。几年来的会员课题研究中，我们也是多次以不同形式参与讨论，甚至相互合作，共同完成。而一些优秀硕博论文，也基本都是在学会学术骨干的指导或协助下完成的。因此，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丛书，在一定意义上是青海民俗学会（前期为筹备组）多年来学术成果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我们从一个侧面对“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做出的一点微薄贡献。

丛书的策划在青海民俗学会成立之前就已经开始，我在2011年5月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领导的邀请赴该社座谈中，就提出了出版青海民俗文化研究丛书的设想，得到社长总编们的赞同，回青海后与同仁们开始商量具体的丛书规划。之后在曹宏举副社长的关心下，我与编辑刘艳女士多次沟通协商，同时各位同仁按规划进行撰写或修改。2012年5月，我拜访了赵剑英社长和曹宏举副总编，正式汇报丛书立意和学术标准以及进展情况，两位领导听后大加鼓励，于是进入了正式实施阶段。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刘艳女士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宏举副总编多次过问，具体指导，关心支持学术事业和西部文化的情怀也让我感动。所以我当然无法脱俗地要真诚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刘艳女士，同时也感谢多年来与我兄弟姐妹般亲密合作的青海民俗学界同仁和本丛书的各位作者。

2012年9月20日于西宁上滨河路1号

目 录

绪论	(1)
一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1)
二 研究思路	(3)
三 有关术语的界定	(9)
第一章 苏木世村的地理与人文环境	(16)
一 苏木世人的家园	(16)
二 苏木世村的人文环境	(19)
第二章 村落信仰	(39)
一 藏传佛教	(39)
二 民俗宗教	(51)
三 信仰民俗结构及其功能	(68)
第三章 物质生产民俗	(77)
一 农 业	(77)
二 交 通	(85)
三 商 贸	(87)
四 生产民俗结构	(88)
第四章 物质生活民俗	(90)
一 服 饰	(90)

二 饮 食	(94)
三 民 居	(96)
四 生活民俗结构	(109)
第五章 人生仪礼	(112)
一 百岁面——诞生仪礼	(112)
二 铺床面——婚姻仪礼	(117)
三 长寿面——贺材仪礼	(149)
四 面琪子——丧葬仪礼	(162)
五 通过仪式的民俗结构	(185)
第六章 岁时节庆	(189)
一 岁时性与节庆安排	(189)
二 节庆的结构与功能	(207)
第七章 语言与口承民俗	(211)
一 村落语言	(211)
二 亲属称谓	(213)
三 民间谚语、俗语和谜语	(214)
四 民间叙事	(223)
五 语言与口承民俗结构	(238)
第八章 多民族村落民俗文化的演变	(240)
一 青海多民族村落的形成	(240)
二 村落民俗文化演变的本质	(246)
三 苏木世村民俗文化的演变内容	(248)
结论	(278)
一 社会转型中村落的“内卷化”格局被打破	(278)
二 多民族村落异质性文化是村落认同和文化融通的结果	(280)
三 多民族村落是多元文化的过渡带	(283)

四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和谐社会建设	(284)
附录一 青海苏木世村(松木石南村)位置示意图	(286)
附录二 主要访谈者名单(2005 年)	(287)
主要参考资料	(288)
后记	(293)

绪 论

一 选题的背景与意义

苏木世村位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县西北部，是一个汉藏杂居的自然村落，行政上又分为南村和北村，属湟中县共和镇，距省会西宁市和佛教名刹塔尔寺各 40 多公里。在这个偏僻的山区村落里，居住着 3000 多口人，主要居民是藏族和汉族，在南村，藏族约占 76%，汉族约占 24%；在北村，藏族约占 25%，汉族约占 75%。

苏木世村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较为特殊。在地理上，该村地处深山之中，外界的变化对村落的影响具有相当的滞后性，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尤其如此。数百年来，这里进行着缓慢的民族涵化过程，这种自然状态的民族变迁过程形成了今天汉藏两族在居住上呈犬牙交错的态势。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社会进入了现代化的转型之中，苏木世村也不断地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逐步打破了往日的封闭与保守，人们开始从试探到大胆走出大山，积极融入市场经济大潮之中。村落的面貌也在发生着变化，修建了乡村路，开通了“西宁—南村”、“湟中—苏木世南村”、“湟源—山甲”的班车，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极大地方便了村民们的生活。

在文化上，苏木世村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祖籍地，这里原为藏族牧业区，人们过着藏传佛教文化影响下的游牧生活。自清朝同治年间汉族开始迁入定居，几百年来，藏文化和汉文化进行着自然状态下的文化交融，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异质性文化。生产方式也从游牧业转变为半农半牧，进而发展为完全的农业生产。20 世纪 70 年代，村中出现

了手扶拖拉机。进入 21 世纪后, 农业机器完全替代了畜力, 畜牧业基本退出了人们的生活; 居住模式由原来的帐房逐渐演变为汉族的庄廓; 语言也从纯粹的安多藏语演变为具有苏木世村特点的汉语方言和结构; 衣食、信仰和礼仪等方面的变化尤为深刻。此外, 在长期的民族交往与交融中, 还产生了许多双血统的藏族人口和姓氏。这些特点使得整个村落文化的交融性特征明显, 形成了有别于附近的汉族或藏族村落的异质性的村落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正在不断演变和转型之中, 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学术价值

民族学价值。苏木世村落文化为汉藏杂居村落中异质性文化的形成, 民族关系发展和演变, 社会转型期多民族聚居地文化演变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实证资料, 具有很高的民族学研究价值。

民俗学价值。以信仰和仪式为代表的村落文化保持了原生态性, 在青海河湟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中继承和保留了大量在其他汉藏地区已经消亡的原始宗教信仰和仪式, 内涵丰富, 极富特色, 具有很高的民俗学研究价值。

文化学价值。苏木世村落文化中保存的古老的文化信息可以为古代文化的诠释提供实证资料, 有助于认识我国古代的某些文化现象。例如, 《山海经》中“其神状虎身而九尾, 人面而虎爪; 是神也, 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的记载与苏木世村的“夏甲群”复合体形象似乎就有某种相似之处, 对“夏甲群”的深入研究, 有可能拓宽对古代文化研究的思维空间。

(二) 现实意义

对苏木世村落文化的全面调查研究, 有助于认识文化交融而产生异质性文化的过程和规律, 还可以了解民族关系的现状和民族杂居村落的文化演变过程, 以及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和发展趋势, 了解多民族民俗的形成对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民族团结方面的现实意义, 在为学科建设积累资料的同时, 回答上述重大问题, 对于进一步做好民族工作, 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研究思路

在多民族村落民俗文化的调查研究中，切入点的选择至关重要。本书以“信仰和仪式”为研究切入点，重点描述苏木世村的人文环境、村落信仰中的神系及其功能、信仰空间的表现方式、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人生仪礼、岁时节庆、语言和口承民俗等内容，并对村落民俗文化结构及其演变作若干思考。在此基础上，力图通过全面的民俗志的调查和研究，进而深入探究村落的文化变迁，以便更好地突出村落文化的特点和个性，从而揭示出社会转型过程对村落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整体框架的把握和篇章结构的安排中以“信仰和仪式”作为统领，将平面描述与总结分析相结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始终把握了一条主旨：通过对苏木世村民俗文化事象的调查研究，探索多民族村落中因文化交融而产生异质性文化的过程和规律，分析其对民族杂居村落中文化认同和共同心理形成的功能，以及对民族关系和对民族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作用；分析民族关系的现状和民族杂居村落的文化演变过程，认识多民族村落民俗的形成对多民族地区的文化认同、民族团结方面的现实意义，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促进民族交融提供学术参考；并为学科建设积累资料，为构建民族地区的和谐社会提供学术借鉴。

（一）采用的理论

1. 民俗志理论

“民俗志”是钟敬文先生在《建立中国民俗学派》一书中首先提出的，并界定为：“民俗志是关于民俗事象的记录。”他认为，“民俗志是很重要的，民俗学的理论，是从实际中来的”。^①在此前的论述中，钟先生将“民俗志”直接称为“民族志”，表明二者之间存在着若干一致性。“记录民俗学”为民俗研究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和视野，获得了民俗学界的广泛认同，成为中国民俗学结构体系中的一个特征。实际上，“记录民俗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历代延续不断，在《山海经》、《风俗通

^① 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